

“万国之子”^{*}

——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多源兼收与开放包容

郟莉莎

摘要：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是印度尼西亚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一生创作了50多部优秀文学作品，已被译成40余种外国文字。民族主义是普拉姆迪亚一生的主导思想和作家本人的创作灵魂，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源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他的人生经历，既受到来自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来自新中国的启发。普拉姆迪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希望被压迫民族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探索与反思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普拉姆迪亚 印度尼西亚 民族主义思想 万国之子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1925—2006，以下简称普拉姆迪亚）是印度尼西亚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也是印度尼西亚最具传奇经历的小说家。他的一生创作了50多部优秀文学作品，他的作品不仅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文学，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文坛都曾引发重大反响。综观普拉姆迪亚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作品，不难看出，民族主义理想既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他文学作品的灵魂和特色。

普拉姆迪亚出生于1925年的东印度殖民地社会，在1945年印度尼

^{*}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以文学的现代化为视角”（项目编号：22JJD75000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西亚民族革命期间开启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彼时，年轻的普拉姆迪亚投身印度尼西亚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中，奔赴前线从事战地新闻报道。1947年，普拉姆迪亚因散发抗荷传单被荷兰海军陆战队逮捕。虽身陷囹圄且遭受虐待，普拉姆迪亚在狱中依然坚持写作，创作出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

两年后，普拉姆迪亚出狱，目睹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社会的萧条景象，他感到深深失望。其后他曾赴荷兰留学，也曾至中国访问，在国外的经历与见闻给予普拉姆迪亚诸多启示。20世纪50年代，普拉姆迪亚加入人民文化协会（简称“人民文协”，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简称Lekra），积极贯彻“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主张。1960年，普拉姆迪亚因写作《印度尼西亚华侨》（*Hoa Kiau di Indonesia*）一书再次被捕，九个月后获释。

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三〇事件”^①，普拉姆迪亚因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并被辗转送往布鲁岛流放，前后长达14余年之久。在艰苦的流放生活中，普拉姆迪亚共创作了11部作品，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1979年，普拉姆迪亚获释后，包括著名的“布鲁岛四部曲”（*Tetralogi Buru*）^②在内的作品相继出版。他的作品在印度尼西亚文坛引发强烈反响，但是很快就遭遇政府禁令，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被禁止出版和传播长达十余年。

“布鲁岛四部曲”是印度尼西亚现当代文学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史诗级巨著，描绘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壮丽画卷。《万国之子》是“布鲁岛四部曲”系列作品中的第二部，讲述的是主人公明克思想觉醒并走上民族主义道路的人生历程。其中明克有一段发自内心的独白：“不

① “九三〇事件”，在印度尼西亚习惯称“Gerakan 30 September”（九三〇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政变。1965年9月30日发生于首都雅加达。其结局是苏加诺政府被推翻，苏哈托开始掌握政权。

② “布鲁岛四部曲”由《人世间》（*Bumi Manusia*）、《万国之子》（*Anak Semua Bangsa*）、《足迹》（*Jejak Langkah*）和《玻璃屋》（*Rumah Kaca*）四部长篇小说组成，由于创作于作者流放布鲁岛期间，因此被称为“布鲁岛四部曲”。

仅仅是欧洲，我自己的民族、日本、中国、美洲、印度、阿拉伯，当今时代一切民族都用乳汁哺育着我……我谦卑地承认，我是古今一切时代的‘万国之子’。”^①这是对《万国之子》这一书名深刻的阐释，标志着明克的思想已经成熟，他已经成为与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万国之子”。同时，这也是对普拉姆迪亚思想的真实写照——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多源的，不仅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也受到中国发展模式的启发；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开放包容，不仅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也承载着他对于民族独立的向往与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不懈追求。他主张尊重印度尼西亚社会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从多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多种民族主义实践中获取经验和启发，采取开放的方式探索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多元、博大且深刻，多源兼收与开放包容是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显著特征。

一、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来源的多样性

普拉姆迪亚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这让他成长道路上广泛汲取了多种文化的滋养，也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呈现出多源性特征。回顾普拉姆迪亚人生经历，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与中国发展模式是他民族主义思想最主要的两大来源。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一）印度尼西亚社会传统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根基

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立足于他成长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他童年时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先驱的感召，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的思想。因此，关注普拉姆迪亚的人生和他所在的社

^① Pramoedy Ananta Toer, *Anak Semua Bangsa* (Jakarta: Hasta Mitra, 2002), pp.185-186.

会就成为了追寻其思想发展轨迹、理解其文学创作的必要途径。

1. 家庭环境的熏陶

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源之一就是他的成长历程，家庭环境的熏陶为普拉姆迪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普拉姆迪亚出生于爪哇小镇布罗拉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杜尔（M. Toer）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激进的左翼民族主义者。杜尔出生于谏义理（Kediri）县，曾接受西方教育。布罗拉位于中爪哇北部，杜尔当时是布罗拉地区小有名气的人物，曾任布罗拉地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PNI，即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主席。该党前身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Perserikatan Nasional Indonesia），成立于1927年，于次年更名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由苏加诺领导，主张“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合法地向殖民者施压，温和渐进地寻求印尼政治、经济上的独立”^①。

在普拉姆迪亚出生前后的时代，印度尼西亚依然处于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之下。从16世纪初欧洲人到达印度尼西亚群岛开始，针对这片富饶土地的掠夺就从未停止过。而印度尼西亚群岛也逐渐走向殖民地社会，原住民的生活由于殖民者的争夺和剥削变得更为困苦。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东印度殖民地社会中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1908年5月20日，第一个民族主义团体至善社（Budi Utomo）在中爪哇的日惹成立。普拉姆迪亚的父亲杜尔就曾经在布罗拉至善社学校任教。实际上，杜尔之前曾于中爪哇南旺（Rembang）的荷印中学任教职，由于他不愿与殖民者合作，毅然放弃了荷印学校高薪的职位。但是在殖民政府的压力下，当时的至善社学校愈发难以为继，由于学校未能得到政府承认，许多学生感到前途无望而最终选择退学。来到至善社学校后，杜尔的薪酬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为生活所迫的杜尔不得不又回到荷印中学做替补教师，这种情况让年少的普拉姆迪亚心中感到十

^① 唐慧、陈扬等编著：《印度尼西亚概论》，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62页。

分不安，尽管他知道父亲的选择是无奈之举，但是他依然不明白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向殖民政府妥协了。^①

虽然父亲的政治理想受挫后一度消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父亲对于普拉姆迪亚政治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他目睹了父亲拒绝与殖民者合作的经历，见证了父亲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的反抗，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在年幼的普拉姆迪亚心中播撒下种子，渐渐生根发芽。在为一本书撰写的前言中，普拉姆迪亚提到，他的家曾经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团体协商会（Permusyawaratan Perhimpunan-perhimpunan Politik Kebangsaan Indonesia，简称 PPPKI）活动的中心场所。而那些油漆喷在墙上的标语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尤为深刻。^②可以想见，普拉姆迪亚的父亲作为布罗拉地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领袖，他与同伴们从事民族运动的勇气和热情在普拉姆迪亚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普拉姆迪亚曾说，“我成长在一个与殖民势力对立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家庭，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成长起来。我们向往一个独立和民主的国家。从我还是个孩子时起，就被告知要去为之奋斗。”^③

2. 民族运动先驱的感召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东印度殖民地出现了最早民族觉醒运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文学正是伴随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殖民地社会中，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最早具有民族觉醒意识的阶层。他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的先进文化，并且被当时国际上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鼓舞，逐步开始进行启发民众、唤起民族意识的活动。民族觉醒先驱的激励和鼓舞是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和定型的重要推动力，也成为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

① Eka Kurniawan, *Pramoedya Ananta Toer dan Sastra Realisme Sosialis* (Yogyakarta: Yayasan Aksara Indonesia, 1999), p.25.

② Pramoedya Ananta Toer, *Cerita dari Digul* (Jakarta: P. T. Gramedia, 2001), p.vii.

③ Andre Vltchek and Rossie Indira, *Exile: Conversations with Pramoedya Ananta Toe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6), p.51.

卡尔蒂妮 (R. A. Kartini, 1879—1904) 是印度尼西亚妇女解放运动最著名的先驱, 也是印度尼西亚最早萌发民族觉醒意识的知识分子之一。她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启发, 渴望民族解放, 并努力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应有的地位。卡尔蒂妮长期与荷兰友人保持书信往来。这些书信被汇总整理成集, 名为《黑暗终结, 光明将至》(*Habis Gelap Terbitlah Terang*)。这部书信集记录了卡尔蒂妮的主要进步思想和言论, 也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卡尔蒂妮从12岁起就依照爪哇传统被幽禁闺中, 但是她的思想没有被束缚。普拉姆迪亚曾经创作传记文学作品《就叫我卡尔蒂妮吧》(*Panggil Aku Kartini Saja*), 这部作品收录了关于卡尔蒂妮的生平、言论、书信以及对她的评论等大量资料, 普拉姆迪亚为此曾进行了大量的材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传记序言评价说: “这是一部关于卡尔蒂妮的宏大而杰出的作品, 不仅记述了一名女性在其时代背景下的生活, 而且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① 这部作品不仅可以看作关于卡尔蒂妮的传记作品, 更是普拉姆迪亚对卡尔蒂妮进步思想的推崇与致敬。

除了创作《就叫我卡尔蒂妮吧》之外, 普拉姆迪亚还在其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布鲁岛四部曲”中塑造了卡尔蒂妮这一人物, 表达对这位年轻女性的赞赏。第三部作品《足迹》中曾盛赞卡尔蒂妮“不仅仅是在写作, 也不仅仅是在讲故事, 她已经把她的生活奉献给了某种东西。她写作不是为自己成名。作为穆尔塔图里的精神继承人, 她已经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到了人道主义的胜利, 减轻了人类的痛苦”^②。

除卡尔蒂妮之外, 迪尔托 (1880—1918) 也是对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迪尔托全名迪尔托·阿迪·苏里约 (Tirto Adhi Soerjo), 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先驱的另一代表。迪尔托出生于爪哇小镇布罗拉, 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① Pramoedya Ananta Toer, *Panggil Aku Kartini Saja I* (Bukittinggi, Djakarta: N. V. Nusantara, 1962), p. VI.

② Pramoedya Ananta Toer, *Jejak Langkah* (Jakarta: Lentera Dipantara, 2006), p.42.

也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他是原住民中第一个运用新闻媒体为武器与西方殖民者斗争的人。他使用通俗马来语进行写作，反映殖民地社会民族觉醒初期的面貌，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拉特纳姑娘的故事》(*Tjerita Nyai Ratna*) 和描写自己人生经历的自传式作品《布梭诺》(*Busono*)。迪尔托于1918年去世，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曾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新闻事业之父”。

迪尔托对于普拉姆迪亚思想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普拉姆迪亚将他作为其最重要的作品“布鲁岛四部曲”中主人公明克的原型人物。迪尔托与普拉姆迪亚虽从未有直接联系，但他们总被一种无形的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迪尔托1880年出生于布罗拉，45年后普拉姆迪亚同样降生于这个小镇。尽管当时的迪尔托已经英年早逝，但他的言行在诸多方面对普拉姆迪亚产生了深远影响。迪尔托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并创作揭露殖民地社会本质的作品，他同情殖民地民众的遭遇，这些都能够使得普拉姆迪亚与其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普拉姆迪亚敬重迪尔托的胆识与勇气，推崇他的思想和理念，于是在布鲁岛的艰苦岁月中他在心中塑造出了明克这样一个形象——同样出生于布罗拉^①，同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由此看来，折射于明克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也许不仅仅是迪尔托的斗争与成就，更有普拉姆迪亚对自己的期许。

（二）两次新中国之行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启发

作为一名文学家，普拉姆迪亚投身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心系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他生活的年代，印度尼西亚曾面临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等重重困境，普拉姆迪亚对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反复进行观察与思考，试图寻找适合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获得文化合作基金赴荷兰留学期间，他也不忘以敏锐的目光去审视荷兰的国

^① 原文为Kabupaten B，直译为B县，多数学者认为B县其实就是普拉姆迪亚的故乡布罗拉(Kabupaten Blora)。

家建设，思考印度尼西亚是否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在判断荷兰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印度尼西亚国情之后，失望的普拉姆迪亚却在对新中国的访问中收获惊喜。普拉姆迪亚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到访中国，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极大地鼓舞了普拉姆迪亚的热情，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在回国后呼吁知识分子阶层在国家建设中积极发挥作用。两次中国之行充实了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也成为他政治理念与文学创作思想的转折点。

1. 第一次访华后：积极投身到政治中去

1956年7月，普拉姆迪亚收到来自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邀请信，被邀约参加10月中国作家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①彼时的普拉姆迪亚，已经了解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也曾阅读过《阿Q正传》的荷兰语译本，还知道鲁迅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除此之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并不多。由于时间紧张，普拉姆迪亚来不及对鲁迅及相关知识作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行程。那一时期的普拉姆迪亚，一直在苦苦寻求印度尼西亚民族发展的出路，渴望印度尼西亚的知识分子阶层能够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此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无疑为他心中的疑惑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回答。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了启发并看到了希望，他曾写道：“中国作家享有很高的地位。社会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与政治家一起组成了精神领导层，在这个时代的国家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作家广受社会的尊重。”^②

尽管普拉姆迪亚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以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为契机的，但是此行的收获显然不止于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更多的是收获对印度尼西亚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启发。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普拉姆迪亚在出访中国前后发生的明显变化，也肯定了访问

① Pramoedya Ananta Toer, *Nyanyi Sunyi Seorang Bisu* (Jakarta: Lentera, 1995), p.158.

② 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NUS Press &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47.

中国对他的影响。《普拉姆迪亚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书曾提到，“普拉姆迪亚与人民文协起初并无联系，但是在1956年他出访中国之后，他的思想开始与人民文协的路线相吻合”^①。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之行为普拉姆迪亚关于印度尼西亚文学和社会发展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与其说是中国影响了普拉姆迪亚，不如说是普拉姆迪亚主动选择并接受了中国的影响，他为祖国和民族寻求发展道路的尝试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中国发展模式恰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范式。此前的普拉姆迪亚从未表现出用政治手段解决印度尼西亚社会问题的设想，而到了1957年2月，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观。他在印度尼西亚日报上发表《吊桥与总统方案》（“Djembatan Gantung dan Konsep Presiden”），支持苏加诺的“有领导的民主”（Demokrasi Terpimpin），而这个明确的态度仅仅出现在“有领导的民主”这一概念提出三天之后。《吊桥与总统方案》是普拉姆迪亚的第一篇政治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普拉姆迪亚开始尝试用政治的重新建构去解决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困境。梁立基教授认为，这一表态表明他已结束了彷徨时期，在立场和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久后他加入人民文协，开始了创作生涯的新一页。^②

2. 第二次访华后：将文化理念付诸实践

普拉姆迪亚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是在率团参加首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回程途中，会议的参会经历与访问中国的行程都带给普拉姆迪亚诸多启示。1958年10月7日，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在乌兹别克塔什干隆重开幕，普拉姆迪亚率领印度尼西亚作家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亚洲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中国、塞浦路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本、约旦、朝鲜、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越南等国的作家代表，还有来自非洲

① Eka Kurniawan, *Pramoedya Ananta Toer dan Sastra Realisme Sosialis*, p.113.

② 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692页。

等国的作家代表，中国则派出了由茅盾作为团长带领的由21位中国作家组成的代表团与会。此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程，分别为“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以及“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来自40多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就这两个议程进行发言，共同切磋。

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对于亚洲和非洲各国的作家来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会议结束后，普拉姆迪亚还曾访问了中国、缅甸等国家。第二次访问中国期间，他先后在北京、武汉、成都和昆明等地停留，与中国作家就几个关心的议题进行了探讨，之后于1958年10月21日回到印度尼西亚。这次参会经历无疑对普拉姆迪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会后对中国的访问也使他深受触动，这种创作思想的转变体现在他之后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之中。

如果说第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使普拉姆迪亚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而惊叹，那么第二次访问中国则让他收获更多经验与启示，意义更为深刻。他曾经称北京为“亚非的象征”，呼吁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一个统一阵线，以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①德欧教授也在其著作《印度尼西亚新文学》(*Sastra Indonesia Baru*) 中肯定了中国之行对普拉姆迪亚的影响，他评价说，“很显然，正是从北京回来后，这个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成为了一名有实际行动的社会斗士”^②。

二、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包容性

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是丰富而深刻的，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与深化，在民族独立前与民族独立后呈现出不同的诉求与目

① Pramoedy, “Tasjkent-Peking”, *Tiongkok Rakyat* 1 (1959): 48-50, 转引自 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p.251.

② A. Teeuw, *Sastra Indonesia Baru I* (Nusa Tenggara Timur: Nusa Indah, 1980), p.226.

标。普拉姆迪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不是封闭的，他广泛吸收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发展范式的启发。与此同时，普拉姆迪的关注对象，逐渐从身边的弱者扩展至受殖民统治压迫的同胞，并逐步发展为世界各个受压迫的民族，这也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升华至崭新的高度。

（一）与时偕行：追求民族独立与探索民族发展道路

随着普拉姆迪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逐渐深入，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更加充实与丰富。从时间维度上来看，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独立前表现为要求政治独立的诉求，而在独立后主要表现为对民族发展道路的追寻。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普拉姆迪的民族主义思想内涵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他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注从未改变。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始终都是为了谋求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平等和繁荣富强的国家。

在1947至1949被荷兰殖民政府关押期间，普拉姆迪的文学创作未曾间断，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出“普遍人道主义”的倾向，对于战争残酷面的暴露较多。1949年底出狱后，他目睹社会的萧条与人民的苦难生活，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聚焦于当时社会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揭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对小人物寄予同情，同时抒发了对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愤慨。

尽管如此，普拉姆迪的思想并没有止步于失望与悲观，而是在困境中奋力探索出路，以积极的心态为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寻求正确的发展方向，并努力去借鉴来自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普拉姆迪两次访问中国的见闻，尤其是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国家建构和民族发展的理解更为深刻。在1958年10月18日亚非作家会议闭幕之时，各国作家代表共同通过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其中写道“塔什干会议，着重指出了文学创作同各民族斗争的深刻关系。作为作家，我们充分意识到，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从事伟大的、令人愉快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创造。我们也

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同我们人民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同他们一道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毒害，反对核武器战争的威胁，争取和平和我们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①这次会议与宣言对普拉姆迪亚产生很大触动，以至于那一时期，普拉姆迪亚对于人民的力量以及文学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充满信心。1962年，普拉姆迪亚写作的文章连载于《东星报》专栏中，其中一篇文章曾提到人民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人民才是繁荣的创造者。^②

在这一时期，普拉姆迪亚有两部作品颇具代表性，其一是1958年出版的《南万登的故事》（*Sekali Peristiwa di Banten Selatan*），描写农民阶层反抗地主的斗争；另外一部是《铁锤大叔》（*Paman Martil*），这部作品以一个修鞋工人为主线，艺术性地重现了1926—1927年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民族大起义。《铁锤大叔》是以《新报》在1926—1927年的报道材料和普拉姆迪亚个人进行的专访为素材，经过艺术加工而创作出的第一部正面描写印度尼西亚民族大起义的作品。^③这部作品真实再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起义波澜壮阔的情景，赞扬起义者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也表现出普拉姆迪亚对于工人阶层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所给予的肯定与赞美。

以上两部小说的选材并不是偶然的，明显地反映出普拉姆迪亚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这两部作品受到当时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普拉姆迪亚开始深入群众中去，亲自去万丹体验农村生活，与农民和矿工生活在一起，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和

① 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3页。

② Pramoedya Ananta Toer, *Yang Harus Dibabat dan Harus Dibangun*, Kolom “Lentera”, *Harian Bintang Timur*, 1962. 转引自Tofik Pram, *The Wisdom of Pramoedya Ananta Toer* (Depok: Edelweiss, 2014), p.36.

③ 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下册，第693页。

工作，了解他们的疾苦和真实的诉求。^①以上两部作品政治倾向明显，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普拉姆迪亚对工人和农民阶层的关注。可以看出，彼时普拉姆迪亚文学创作的关注点已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转移到奋起反抗殖民者和封建主的工农阶层。普拉姆迪亚通过两次访华，以及与亚非各国作家进行交流，收获了全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并将他所获得的灵感与文化理念实践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二）博大包容：突破种族界限的视野与胸怀

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开放包容，还体现于他突破种族界限的博大胸怀。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仅囿于爪哇族或是印度尼西亚，而是将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民族都看作兄弟，这样的胸襟与气度在他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一书中得到集中体现。1959年1月23日，普拉姆迪亚参加了于梭罗（Solo）举行的人民文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Kongres Nasional I Lekra），并被选入人民文协的中央领导层。然而，正在普拉姆迪亚踌躇满志地开始实践他的文学主张之时，他的人生际遇发生了重大转折。1960年3月，普拉姆迪亚出版《印度尼西亚华侨》一书，以书信集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于华侨在印度尼西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的肯定，并且言辞激烈地为华侨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据理力争。这部书出版后不久便因其中有为华人辩护的成分而被禁止出版，随即普拉姆迪亚被关押9个月。尽管这部书信集给他带来牢狱之灾，但是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普拉姆迪亚谈到《印度尼西亚华侨》时依然写道：“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我们不需要继续树敌，我们理所应当去赢得与各族的友好关系，发展更为丰富、更为紧密、更为友善的关系。”^②该书表现了普拉姆迪亚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与对于社会不公的反抗。这种宽广的胸襟与高尚的思想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社会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是普拉姆迪亚人性光辉的折射，也正是其人格魅力的闪光。

^① 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p.258.

^② Pramoedy Ananta Toer, *Nyanyi Sunyi Seorang Bisu*, p.179.

不仅如此，普拉姆迪亚还将他跨越种族界限的民族主义理念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在他的代表作品“布鲁岛四部曲”的第二部《万国之子》中，主人公明克逐步实现了思想觉醒并走向民族运动道路，书中盛赞明克已经成为“万国之子”。其实，“万国之子”更像是对普拉姆迪亚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他无私地关怀与同情所有受压迫民族，对他们的境遇流露出真实的关切，这样的感情已经突破了种族的界限，升华至一个新的高度——开放包容的民族主义。

《万国之子》中塑造了一名华人青年形象——许阿仕（Khow Ah Soe），他是一名清末的中国革命志士，虽出场不多，却成为作品中最具感染力的形象之一。他与明克年纪相仿，但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与活跃的思维。明克在几次与他的交谈中收获颇丰，尤其是明克从许阿仕口中第一次听到了菲律宾的民族觉醒。这个情节的设置颇具典型意义，因为在反抗欧洲殖民者的斗争中，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各民族人民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同受欧洲殖民者的无情压迫，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心存星火燎原之念，致力于唤醒民众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这个意义上，两国人民的遭遇具有很多共同点。许阿仕这一形象的塑造，以及之后洪山梅的出现，都为普拉姆迪亚开放包容的民族主义思想理念进行了有力代言。

结 语

普拉姆迪亚是印度尼西亚现当代文学史中最为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刻而丰富，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民族主义作家”也成为了他本人最清晰的标签，多种民族主义思想内涵深深烙印于他各部文学作品的细节之中。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是他个人的创制，而是立足于印度尼西亚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基礎之上，充分吸收了那个时代亚非拉民族解放宏大背景中的诸多要素，

最终形成了带有印度尼西亚特色的民族主义叙事。民族主义思想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而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超越了狭隘的本土本族，其多源兼收、开放包容的特征决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囿于对本民族同胞的同情，而扩大至对于不同民族命运的关注。他希望世人都能成为“万国之子”，在他的心目中，人类本质上是可以彼此分享的命运共同体。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战争和苦难、没有饥饿和贫穷的盛世是他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普拉姆迪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理性的、开放的，也是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不是狂热的、封闭的，不会狭隘地拘泥于只为本土本族思考。多元文化滋养和充实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坚定、包容的民族主义立场主导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使他的文学作品展现出立足本土文化、跨越多元文化的博大情怀。